

印度對中國崛起之觀點

An Indian perspective on China's Rise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賴潔希)

壹、中國崛起、美國衰退與亞洲地緣政治

中國在 20 年內連續之兩位數經濟增長，已提供它在亞洲與其他地區擴張之戰略與軍事能量來源。如同歷史上其他強權，中國也期望能支配其鄰邦，乃至於世界上其他地方。更甚者，中國崛起還與美國衰落此一趨勢同時發生。即便美國迄今依舊是最具主宰性之強權，其相對衰退仍減損其能量，並為亞洲安全秩序埋下變數。

儘管如此，美國衰退畢竟是個漫長的過程。從 1945 年佔全球經濟總量過半，迄今僅約 20% 左右，顯示其緩慢與漸進之發展；相對地，中國崛起則更引人注目且影響深遠。於此同時，其他若干亞洲國家也出現崛起跡象，例如，儘管步伐比中國稍緩一些，印度在過去 10 年來的快速成長不容忽視。其次，日本正藉由承擔更多的安全責任以邁向「正常國家」(normal nation)，從而提升了東京在亞洲戰略版圖中的重要性。或由於在亞洲與全球戰略版圖中存在之競爭態勢，為若干亞洲國家之間的互動埋下不確定性乃至敵對性。相較日本與印度在亞洲戰略框架中採取彼此調適立場，中國的排外傾向與綜合國力明顯提升，既帶來不安全感，亦推進了周邊國家在外交上的合縱連橫。

進一步來說，亞洲復興作為一項新發展，已然迫使西方不得不調整它們對此區域的態度。例如，Henry Kissinger 便非常正確地將當前亞洲地緣政治與十九世紀歐洲的權力平衡做一對比。¹不過，在地緣政治暗流下，由於歷史包袱以及若干主權、邊界與領土爭議，亞洲的穩定性依舊前途未卜。

貳、中國崛起之可能影響

權力轉移永遠會帶來混亂與不確定性，中國崛起也不例外；可以想見地，它將為亞洲乃至全球秩序帶來緊張與戰略不安。儘管如此，許多學者與政策分析者（例如 David Kang）仍認為，如同中國衰落導致亞洲波浪起伏，一旦中國再度繁榮且擁有經濟能量，將為此區域帶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²中國官方雖不斷重申前述論點，但過去幾年的經驗仍證明此種看法之不切實際，尤其中國的若干作為也不支持此種結論。

相對地，現實主義學派的國際政治學者則提出不同見解；如同 John Mearsheimer 在 2010 年直率指出的一般，「中國根本不可能和平崛起」。³無論亞洲在過去 10 年中的暗潮洶湧，以及中國在外交與軍事上愈發積極之舉措，都肯定了前述看法。因此，可以這麼說，中國崛起即便尚未危及其他大國的安全，亦正在為大家帶來某種麻煩與不便。

即便如此，關於中國變得更強大之後將成為何種大國，依舊引

¹ Henry A. Kissinger, "The Three Revolu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07, 2008, <http://www.henryakissinger.com/articles/wp040708.html>.

² David C.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4 (2003), pp.57-85.

³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 (2010), pp.381-96.

發大量關注與論辯，尤其是中國崛起可能隱藏之危險。首先是伴隨權力轉移而來的不穩定性；儘管這未必針對中國，事實是亞洲其他國家的同時崛起，讓中國崛起變得更具挑戰性且不確定。由於新崛起國家勢必希望介入並主導世界規則，這也讓每次全球性大規模權力轉移都必然導致一定之混亂。多數新崛起國家都缺乏耐心，甚至在它們擁有能力並迫使外部接受其新角色前，便一廂情願地期待大家選邊站，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二十世紀的義大利都是例證。由於缺乏耐心加上無法有效自證其領導力，結果只能帶來競爭與敵對，然後導致潛在衝突。

權力轉移也會影響多邊機制的發展。由於既存機制多半代表舊有且傾向衰落之國際秩序，崛起強權往往對它發起挑戰。例如，近期環繞既存之國際自由秩序是否潛藏危機的討論，便是觀察此種可能變化之不錯例證。⁴目前全球政府制度所面臨之挑戰，正因既存強權與崛起強權彼此意見不同所導致。

至於下一個危險，特別來自中國及其超現實（hyper-realist）世界觀。此種觀點不僅視衝突為必然的，在追求單邊優勢而非多邊並進之餘，亦傾向透過武力來完成前述目標。除軍事力量外，中國也將使用外交與經濟手段，迫使其他國家順從其期望方向；正如同 Evan Feigenbaum 指出的，懲罰逐漸成為中國對外經濟關係中的「新行為規範」。⁵當然，這並不意味其他國家的對外經濟都是利他的，只不過

⁴ For a critique of this debate, see Paul Staniland, "Misreading the 'Liberal Order': Why We Need New Think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awfare*, July 29, 2018, <https://www.lawfareblog.com/misreading-liberal-order-why-we-need-new-thinking-american-foreign-policy>

⁵ Evan A. Feigenbaum, "Is Coercion the New Normal in China's Economic Statecraft?" *Macro Polo*, July 25, 2017, <https://macropolo.org/coercion-new-normal-chinas-economic-statecraft/>

中國似乎更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且更關注其自己的長程目標。⁶至於此種行為的結果，往往使其將自身看法強加他人身上，最終迫使其他國家一致站到中國的對立面，由此既激怒中國，從而也帶來某種關係之惡性循環。

參、中國之行為取向及其威脅

前述超現實主義往往由國內的超民族主義所驅動。中國政府或許傾向鼓勵此種發展來鞏固其權力，但相對地，此一趨勢也將縮小北京處理危機時的轉圜空間。到目前為止，依舊牢牢控制傳統與新興媒體之中國政府，雖似乎還能操縱此種超民族主義，並引導它們發洩至日本與南韓身上，但不能排除某種失控的可能性；尤其當北京過度自滿於自身操控能力時，此種民族主義狂熱之發展更可能無法預測。

既存的領土爭議為此一區域增添了不可測之潛在衝突因子。從日本到南中國海，乃至與印度之間的西藏邊界爭端，中國與許多周邊國家都存在領土糾紛。很明顯地，並非只有中國對這些問題的現狀感到不滿，其他領土爭端國也很有意見。由於許多當事國都是非常重視領土完整與國家主權的後殖民新興國家，這意味它們在領土議題上沒有太多妥協空間。儘管多數國家的領導階層還算是理性謹慎，多半傾向將問題留待下一代來解決，北京顯然是個例外，顯然它並不傾向接受現狀，甚至意圖透過武力來解決爭端，從而使其踏出了危險的步伐。

⁶ Josh Rogin, "Inside China's 'tantrum diplomacy' at APEC,"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3,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josh-rogin/wp/2018/11/20/inside-chinas-tantrum-diplomacy-at-apec/?noredirect=on&utm_term=.4cfed0cb7dfb

最後，對其他國家來說，它們對可能由中國領導的體系也缺乏信任感。中國雖似乎企圖重拾對區域之傳統支配權，其他國家並不能完全理解其動機與想法。一旦爆發某種危機（印度與中國之間的洞朗衝突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我們實在搞不清楚，這是由於某些誤解或地方官員自行其是所致，抑或是中國政府部門彼此之間無法溝通的結果，還是中央政府之有意作為。由於中國的目標嚴重缺乏透明度，致使其他人不得不傾向「料敵從寬」，只能根據最壞打算來處理問題。總而言之，前述誤解與互不信任對區域和平與穩定乃一大挑戰。

肆、結論

如同過往權力轉移的慣例一般，中國崛起既帶來某種不確定與不安全的想像，加上中國難以測知目的之作為，最終把情況變得更糟糕，從而讓諸如印度之類的周邊國家，不得不採取它們自己也不太願意的作為。個人衷心期盼，在一個愈來愈趨不穩定的亞洲最終傷害中國的利益之前，北京能認清現實且懸崖勒馬，否則的話，所謂「亞洲世紀」(Asian Century) 或將迎來一個大家都不希望的負面結局。

